读史札记

善耆与革命党

孙燕京　周福振

爱新觉罗·善耆 (1866– 1922 年)，字艾堂，满洲镶白旗人，第十代肃亲王。善耆积极参与新政，同时又主动联络革命党人，“曲意交欢革命党”①，成为 20 世纪初十年政治舞台上一个较为开明的上层亲贵。

一、任用、宽容与策略

清末地方督抚和朝中大员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多不敢任用新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人“昌言排满”，多与政府作对，是极其危险的破坏分子，所以在任用新人时往往慎之又慎，生怕遇到自己的“掘墓人”。1902 年，留日士官生吴禄贞毕业时，日本人福岛寄书询问张之洞，“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张之洞答应了，却让吴禄贞在“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②。1907 年，孙宝　的二个表侄“来都投效，皆江南武备学堂毕业生也。铁帅 (指铁良) 不敢留，曰防其为革命党；又闻是浙人，愈不敢用”③。清政府有时故作“明智”姿态，说南方各省捕抓革命党甚严，为了不造成诬陷，各省“只须判其有罪无罪，不必问其是党非党”④。实际上却常因“革命党多藏政界，新进少年不可用，特电各督抚令查用旧日老臣及宿将，听候简用”⑤。清廷压抑少年新进，起用老臣，是惕于革命党，客观上却为新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打开了绿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善耆爱惜人才，大胆任用革命党人，便瞩目于一时。

1907 年，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他延用革命党人程家柽、谷思慎为幕僚。程家柽 (1874– 1914)，安徽休宁人，1899 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习。同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东京本部外务科负责人。谷思慎 (1881–1945)，山西神池县人，幼聪慧，涉猎群书，辄能背诵。1904 年作为山西保送的第一批留日学生进入明治大学攻政法专业。同盟会成立时，谷思慎任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陕西省主盟人。对这样的革命党人，善耆仍能重用。他把程家柽作为“学界魁杰”　“引之以自重”，“备道倾慕”，“言之殷勤”⑥。

汪精卫暗杀未遂被捕入狱，善耆没有过多难为他，而是“再三慰问，极致钦崇”，这在满洲贵族中是比较难得的。史载，“贝子溥伦来则一问姓名即仓皇去，欲见而又　也”⑦。汪精卫被捕之前，因在《民报》上宣传革命而名扬大江南北，善耆仍力主不杀，足见其对人才的重视。善耆还经常给汪精卫送食品，甚或赠以钱物。

民政部侦探长史伯龙，对新派人物视若仇雠。善耆对史伯龙的行为很是不满，命令民政部高等警察科朱君伟密查史伯龙的行为，甚至

[收稿日期] 2004– 10– 15
[作者简介] 孙燕京 (1956—)，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福振 (1982—)，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2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把史伯龙驱回原籍。值得一提的是，朱君伟也是革命党人。善耆在任用新人的问题上不问其是不是革命党，惟问其是否有才。他曾大话道："只要你们汉人弄得好，咱们旗人滚蛋都行。"⑧

善耆能够任用革命党人，与他开朗、为人豪放的性格分不开。新政期间，善耆以亲贵身份着意考求，被称为"新派"。⑨对知名之士，善耆必多方网罗、礼遇，以至肃亲王府常以宾客称盛，结果民政部里革命党人十分活跃。他们之所以愿意投到善耆的门下，概因善耆比较开明，能一定程度上做到知人善任。善耆比较大度，对别人的讦难，只要有理，他必定改容谢之。有一次，担任外城巡警总厅行政处佥事的许世英因为善耆的福晋违反了交通规则而处罚了她，善耆问明情况后，不仅没有惩罚许世英，反而提拔了他。另据黄复生回忆，善耆"生平最喜读《民报》，出一期，读一期"，并且"读《民报》阅《天讨》增刊所绘之《翼王夜啸图》及《射狐图》诸篇，尝服党人程度，可以服革命矣！"⑩善耆这些行为并不一定是欺骗或者假象。

当然说到底，善耆联络革命党人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是对政治反对派的一种笼络、软化，或者说是一种利用。

首先，善耆联络革命党人出于对革命势力的惧怕。清末，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武装起义与革命暗杀并行不悖。暗杀手段极易造成统治者心理上的震撼。徐锡麟暗杀恩铭后，在供词中写道，要"杀尽满人"，"本拟杀恩铭再杀端方、铁良、良弼"[11]。善耆作为满洲亲贵，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因而"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并且"罗致皖省党员程家柽遣至东京，愿贡献万金于同盟会本部，以尽友谊，声明绝无条件"。[12]实际上，自称绝无条件，其实是想方设法暗中影响同盟会。1908年夏，善耆派程家柽给东京同盟会总部送去三万元，转达愿与"同盟会修好之意"。此事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虽渴不饮盗泉"，有人认为既然是"好意，收受无碍"，章太炎也认为"此款如用途正当"就可以收下。结果，善耆"修好"之举，客观上造成了革命党内的意见分歧。[13]

其二，为了寻求革命党人的支持。善耆交接革命党之时，正是清政府抓紧新政之日，为赢得时间，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缓解社会矛盾。善耆想有效地赢得时间，又不可避免地直面革命党人。再加上一些新知识分子主观上对宪政的期许，造就了"利用"和"迎合"的可能。1908年，程家柽到东京会见刘揆一时说："肃亲王善耆存心与革命党人修好，且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14]可见善耆联络党人，不仅是对革命暗杀的一种恐惧，更重要的是期望获得党人的支持，以从容地推行宪政，从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善耆的根本目的。

其三，善耆联络革命党人是想借重革命党以求得到日本的支持。清末留日一些学生和日本政客、官僚、维新人士时相过从。善耆倾慕日本的明治维新，希望中国能像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在善耆看来，程家柽等人不仅是通往革命党的桥梁，而且也是沟通日本政府的使者。载沣罢黜袁世凯后，善耆听说袁世凯通过唐绍仪运动美国设法迫使清廷收回成命，赶紧让程家柽密切观察取道东京赴美的唐绍仪动态。据当时日本警方情报，程家柽不仅以"肃亲王秘书"的身份活动，经常与善耆通信，而且携有善耆致西园寺首相的亲笔信。[15]

其四，善耆联络革命党人，甚至采取某种宽容政策，是为了显示清政府实行新政、立宪的诚意，从而消弭革命。清末频繁发生革命党人案，对于此类案件采取何种政策，在清朝统治者内部存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善耆主张用宽容的方法。刘静庵案发后，被捕的革命党人一度生命危急。程家柽"假善耆之名，致电张之洞，陈狱之冤，为其开释"。事后善耆没有为难程家柽，还派"刘道仁请于张之洞，改其（指胡瑛——引者注）斩决罪为十年之监禁"[16]。后来刘静庵等人均从轻发落。徐锡麟案发后，"司道叙议，主张援张文祥刺马新贻例，剖心祭恩铭"，毓朗"主先挖心后斩首"，更有甚者"竟有议诛九族"，"军机处也拟恢复族刑，以戒将来"。善耆却坚决反对，他提出一要"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要"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17]。善耆主张用宽松的方法软化革命党，试图使革命消弭于"无形"。可见，善耆颇有政治经验，这种经验实

际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汪精卫案发于 1910 年，暗杀的对象是监国摄政王载沣，是明目张胆的“谋反”行为，不啻是对清政府立宪诚意的严峻挑战。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在绝笔书里，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供词中更是争当主谋，力求速死，汪精卫还高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8]。法部尚书廷杰等议处极刑，但最终却判为终身监禁，这是善耆力争的结果。善耆认为革命党人遍天下，旦夕且暴发，汪精卫乃“一文人，不若久锢，徐讯其党之秘计，即不能尽得其实，得其半或一二足以资戒备”。他还下令把“所有侦获与此案有关系之汪精卫等之密件一律焚毁灭迹”[19]。

党人案最终受到宽大处理，归根结蒂还在于清政府一定程度上做出刷新政治的姿态。善耆对革命党人采宽容政策，可以说顺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从刘静庵案、徐锡麟案到汪精卫案，由于善耆的坚持，清政府并没有采取族诛等严酷的刑罚，而是量刑越来越轻。善耆在处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案时，“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让他站着说话，不下跪。汪精卫被判“永远监禁”后又安然出狱，这些都说明清政府实行新政以来，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变得开明了。以“欺骗”“假象”来解释新政，恐怕不那么符合历史真实。

恰如孙宝　所说，只要朝廷“执持公道，以服其下，且尽心教养，多启生途，以收贫民，俾有所归，如是则附从者寡，党人势孤，不攻而自息矣”[20]。当然，这需要看清政府有没有这个气度与能力。

二、利用与反利用

善耆联络革命党人，目的是利用他们。此期善耆主要依重对象为三，一是善耆的内亲崇铠（字铁庭，满族人），一是程家柽，一是谷思慎。此三人中，程、谷奔走最多。他们立场又各不相同：崇铠是为善耆的利益；谷思慎是为同盟会的利益；程家柽则看顾双方。[21]他们也确实为善耆联系了一些新式人才，善耆 1905 年受命出使蒙古时，程家柽把革命志士吴禄贞推荐给善耆。吴禄贞跟随善耆视察后，写下了《经营蒙古条议》和《东四盟蒙古纪实》，指出日本和俄国侵略蒙古的野心，并阐明了经营蒙古的一些建议，大都得到了善耆的认同。

善耆利用革命党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利用善耆。善耆把程家柽作为幕僚时，听从了他的很多建议，但程家柽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身分和善耆的关系，多次掩护和营救革命党人，如胡瑛、孙毓筠、孙铭、白逾桓等。1908 年，善耆让程家柽到日本为之联络革命党人。程对宫崎寅藏说：“满清政府利用我侦探革命党的内情，我反过来利用他们取得金钱，送给民报社为革命尽力。”[22]程家柽在留学东京时，就为同盟会规划了三种行动方案，其中第一策是“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推倒政府”。归国后，他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农学教习，得以有机会实施第一策。程家柽的方案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同，孙中山让法国陆军中将卜加贝把书信交给程家柽，要他“扩充同盟会于北京”。他便以“善耆之事密告孙文，藉以徐张党势”，于是他厚结善耆左右，如王英、吴丁等。善耆的门下刘道仁等也先后由程家柽介绍加入同盟会。另外，程家柽在京师大学堂讲学之际，经常私下里讲一些“民族民权民生之旨”，“故其门下之识大义者最多”，后来成为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就因常听程家柽讲学而有了共和思想。[23]1911 年初，同盟会会员白逾桓、景梅九等人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后来，《国风日报》成为京津革命党人的机关报），程家柽是创办人之一。程家柽一直为革命奔走，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联络京津革命党人，“意在直举首都革命”。至此，善耆只得与良弼悬赏15, 000 元通缉程家柽。他们收买的日本浪人须佐橘治在海岱门内麻线胡同寓所狙击程家柽，但是程家柽还是在友人的帮助上逃离了北京。[24]

在善耆与革命党人“利用与反利用”的较量中，最终是同盟会借助善耆的掩护在京津地区获得了更大发展，特别是善耆对汪精卫案从轻发落，风声所树，各省大吏亦多不肯过于为难革命党人，革命时机渐趋成熟。

善耆本想消弭革命于“无形”之中，反而给革命党人提供了方便。这不能不说明善耆联

络革命党人政策的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首先是善耆的能力不足。康有为在积极联络满洲亲贵时，曾经说过“肃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25]。奕 说善耆“仁柔”[26]；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也认为善耆是一位“仁者”，“只为仁者，难得天下”[27]。善耆虽然比较开明，但却缺乏勇毅和果断。善耆曾告诉王照，他编练的消防队和正式军队一样，遇到危险时，可以借救火为名保护皇上。但事急之际，他尽管同情光绪却因无旨而不采取积极措施。王照说：“太后未死，哪得降旨？”“不冒险恐不济事”。善耆却说：“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曾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28] 善耆在危急时刻，还为条条框框所缚，缺乏魄力与果断。他对程家柽一度言听计从，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张鸣歧“日电民政部，告以党人尽入长江、北京”，情况可谓紧急。善耆密询程家柽，程家柽已经接到宋教仁的信，知道革命党人将要起义的消息，却笑着对善耆道：“党人明者大半矣，余者尽走东南洋耳，海内寥寥，无足惶 。”善耆深信之，反而“以君言而胥弗听”他人意见，不采取积极措施。这样，田桐、白逾桓、景定成、熊可武等革命党人“经营于清廷辇毂之下”[29]，反而无事。

其次，善耆在满洲亲贵中辈份较低，说话的分量自然相对轻了一些。善耆属溥字辈，与溥仪同在一个辈份，见了奕 要称“老爷”。在很多情况下，善耆的一些建议得不到采纳，而且经常被弹劾。奕 经常批评他“政事荒唐”、“轻佻误事”，他对奕 有很大的意见却也没有办法。善耆辈分低而实力不足，也是他未能成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

当然，善耆联络革命党人政策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善耆审问汪精卫刺杀案时，问汪精卫：“从此改矣乎？”汪精卫说：“不杀之恩不敢忘，若朝政清明，自当效奔走。否则，不能为一身挠大计也。”[30] 汪精卫在洋洋四千言的供词中，指出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实由革命始，并且警告清政府如果不力行立宪国必亡，以致摄政王载沣认为他“误解朝廷政策，出此激烈”行动。慈禧新政之时，历史已经不再给清政府多少自新的机会了。庚子后庶政窳败，财政危机尤为严重。1907年，国家外债达“一万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万八百三十九磅（通用银约十一万万三千七百十万八千三百九十圆），若再将铁路公债加之，未偿还者计一万万三千五百三十七万八十磅（约通用银十三万万五千二百七十八万八百圆）”[31]。新政“千帆并举”，急需钱财，不得不变相增加税收，使这些初衷不坏，从长远看也对人民有利的政策，终于演变成了一种“对人民实行暴政的罪恶政策”。“新政愈实行，财政资源愈益枯竭，而人民愈益痛苦”[32]，清政府统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戊戌为因，庚子之果也。清之亡，实亡于庚子而非亡于辛亥”[33]。“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一两个开明的高层统治人物根本不可能阻止革命的发生。

善耆想利用革命党，结果反被革命党利用，这对善耆个人来说大概是个悲剧。但是，在革命党人看来，善耆仍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汪精卫说善耆是“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程家柽对善耆也是深有好感，把他视为“满洲人中的杰出人物，人格见识都属第一流”。[34]

三、回天乏术

善耆联络、任用革命党人，以致朝中许多人以为他暗通革命党。袁世凯多次弹劾善耆用人太杂。慈禧对他亦颇有成见，“尝疑其用人太滥，责曰：‘善耆与党人通。’至厉声呵之”[35]。善耆为汪精卫等人求情免死，许多人认为他“通革命党”，甚至有人说“其沟黄兴由朱还也”。这样，“蜚语达内廷，监国已疑之”。[36]

但实际上，善耆对革命党人各种“示好”，并不说明他愿意去搞革命，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清王朝的利益。善耆认为三民主义有偏狭的一面，对汪精卫说：“《民报》所鼓吹之三民主义，余以为过狭，世界一家，何分五族？君等何不扩充范围，而言大同主义。”[37] 他争辩再三，是想说服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放弃三民主义。

1907年，章太炎致书肃亲王善耆，想让善耆加入同盟会，并作了这样的设计：

“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固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亦何不可预……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设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日骤，日本、露西亚诸党人多有交臂请盟者，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38]

章太炎的建议遭到了善耆的拒绝。另外，日本志士加藤仡夫为革命党人致书善耆，要求拨出西藏为民主政治实验国，也遭到善耆的拒绝。善耆没有打算以皇族身分来对抗自己的政府，他认为只要实行立宪就可挽救民族的危亡、维护清王朝统治，而拨出西藏为民主政治实验国，会损害清政府“一统无外”的局面。

善耆虽然与革命党保持联系，但就他的地位和身份来说，毕竟和革命党人不是同路人。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之火迅速蔓延，“识者已知清之必亡。盖督抚什九弃城遁，以身殉节者，闽督松寿、晋抚陆钟琦、赣抚冯汝 三人而已。降者亦三人，鲁抚孙宝琦、桂抚沈秉 、苏抚程德全”[39]，形成了清帝不倒台、不退位，革命决不会罢休之势。这引起了满族人士的恐惧。章太炎在东京看到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于是写了《致留日满洲学生书》，说辛亥革命是要建立共和政体，并非与满族为难，“肃王心亦默知”。但事实并非如章太炎所言，善耆面对革命形势，并没有认同革命，而是指摘革命，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实际也是清政府新政和立宪所力图达到的，因此没有革命的必要。而且，他还认为种族革命会破坏民族团结。善耆说：“政治革命，朝廷已设计实行立宪；如曰种族革命，则何以示满、蒙、藏、回诸人。”[40] 善耆属于亲贵中的强硬派，认为“东西各省之纷扰殆同儿戏，倘中央政府立定脚跟，各省自然瓦解”，“要镇定毋自惊扰”[41]。善耆还采取种种行动来稳定清王朝。辛亥革命发生时，善耆把两御前大臣蒙古亲王那彦图、公爵博迭苏，军谘大臣涛贝勒、朗贝勒，海军大臣洵贝勒，陆军贵族学校校长润贝子，资政院总裁伦贝子、度支部大臣载泽、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等一干皇亲国戚召集起来商量对策，讨论起用袁世凯和对付革命党人的问题，但这些举措均归于徒劳。

善耆任用革命党人，并多用留日士官生，原本想暗中挤掉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并促进立宪及早实现，结果却造成了京津地区革命党势力的增长，反而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

1912年2月，清帝宣布下诏退位，善耆拒绝签字，成为当时唯一没有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善耆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协助下奔走旅顺，留下了《辛亥十二月出都口占》：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42] 这首诗表明善耆想以辽东为基地，试图东山再起。民国的建立，标志着善耆利用革命党人，消弭革命策略的失败。然而，善耆并不认为清政府一败涂地、无药可救，他为重建清王朝的统治而四处奔走，致力于各种复辟活动，还约束他的子女“不履民国寸土”[43]，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权利给日本。由于善耆对清王朝忠心耿耿，被废帝宣统赐谥为“忠”。

清末时局跌宕起伏，如冰海行船，需要统治者有极高的胆识和政治技巧。善耆一方面积极推动新政建设，一方面任用革命党人，对其采取优容甚至礼遇政策，可以称得上明智之举。他主张刷新政治，反对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善耆参加宗社党复辟，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是逆潮流而动的人。他誓死不忘清朝大业，也印证了他积极联络革命党人只是一种策略。对善耆来说，曲意笼络革命党人，走向失败再走向复辟，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个人悲剧。

---

①冯自由举四事为证：一为丙午年湖北日知会刘静庵等人之狱；二是丁未安庆徐锡麟之狱；其三引用老革命党员程家柽为幕僚；第四则是庚戌年黄复生、汪兆铭炸弹案。这四次革命党人案最终未得严办，多是善耆“转圜之力”。见《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2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刘体仁著：《异辞录》，第四卷第53页，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③孙宝 ：《忘山庐日记》，第10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面谕搜捕革命党之方针》，丁未正月廿八日礼拜二，见黄季陆主编：《中国日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9 年版。

⑤《用老臣办新政》，丁末十月初九日礼拜四，黄季陆主编：《中国日报》。

⑥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六集，第 212 页，1971 年版。

⑦见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第 25– 26 页，东莞张氏拜袁堂校印，民国三十二年版。

⑧《南亭笔记》卷一，第 6 页。

⑨ 生活方面善耆也属于新派，参见 [美] 赫德兰著、吴自选、李欣译：《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相关部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⑩《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第 26 页；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案始末》，见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五集，第 384 页。

11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三集，第 417 页。

1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 214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13《革命逸史》第五集，第 228 页；张明林、华山主编的《大清王朝• 宣统王朝》一书认为程家柽并未携带钱款，章太炎因《民报》经费问题导致党内冲突，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4《大清王朝• 宣统王朝》，第 17 页。

15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122 号警视总监龟井英三郎给小村外务大臣的报告”“高警秘第 869 号京都府知事大森钟给小村外务大臣的报告”，以及“乙秘第 1000 号”警方侦察报告等件；转引自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 33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6《革命人物志》第六集，第 213 页。

17 善耆说：“革命党人，早已甘心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决难禁止其谋。为今之计，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利导久了，祸患自可消灭。倘株连及族，则起咫尺之水，搏之可使过颡；一泓之波，积之或至滔天，岂是善计?”见《革命人物志》第三集，第 418– 420 页。

18 汪精卫：《小休集序》上卷，第 1 页；中华日报社：《双照楼诗词稿》，民国三十年。

19《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外要闻》。

20《忘山庐日记》，第 1055 页。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86 – 8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22《亡友录•程家柽君》，《宫崎滔天全集》第 2 卷；转引自郭汉民、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第八卷下编，第 215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3《革命人物志》第六集，第 212– 213 页。

24 惠政：《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程家柽》，《纵横》1987 年第 3 期，第 13 页。

25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七日康南海《与任弟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44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6 参见沃丘仲子著：《当代名人小传》，第 17 页，文海出版社 1985 年版。

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连文史资料》第 5 辑，1988 年版，第 124 页。

28 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十一集，第 26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9《革命人物志》第六集，第 217 页。

30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第 223 页，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31《清国现在之外债》，丁末十月初十日礼拜五，见黄季陆主编：《中国日报》。

32 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 142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33 张一 ：《古红梅阁笔记》，第 52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

34 转引自《清代人物传稿》第八卷下编，第 215 页。

35《近代稗海》第十一集，第 306 页。

36《三十年闻见录》，第 223 页。

37《汪精卫先生实录》，第 26 页。

38《革命逸史》第五集，第 230– 231 页。

39 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三辑，第 373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40《当代名人小传》，第 17 页。

41 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 1452 页，中华书局 1994 年。

42 善耆：《肃忠亲王遗稿》，1928 年序石印 30 页，文章开篇或正文第 9 页。

4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二辑，第 62 页，北京出版社 1982 年。